

祖宗的本本,还有“洋教条”,对西方学术的一些本本主义。好像一篇文章中不引用他们的话就没有自信。中国学术的尊严和自主性没有确立起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中国提供了这么多实践经验,应该有自己特色、风格的理论话语的提出。而这个方面,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的成绩还不大。不解决这些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没有办法前进,没有办法发展的。可以讲,社会科学方法是否能创新,已经关涉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自主性和学术尊严的问题,也关系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必须达到一个自觉,这就是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要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科学地把握实际,推动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紧密结合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学术创新;二是要大力引导和推动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这是繁荣发展中国学术的必由之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已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学术研究的原创水平和中国学术尊严的重大问题,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胡锦涛同志在讲到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时就讲到要运

用跨学科方法。他指出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不断把握社会发展的各种规律。

在这一方面,学术期刊确实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责任。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窗口与交流平台及其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原创水平。学术期刊引导学术研究方面至少担当两个职能,一是对问题导向的研究,二是对研究方法的引导作用。要推进、提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繁荣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其实现途径之一。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确实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他们是知识生产、学术创新的有机整体。知识的生产和学术的创新,是多种环节组成的链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载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出版,一个就是学术期刊,当然现在有电子化的发布。我个人认为,学术期刊在更大的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学术的原创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学术期刊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理论创新,确实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所以必须加强期刊与学者沟通、互动,以共同担当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和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使命。

社会科学方法论创新的核心： 把握并切中当今的社会现实

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

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可以有各方面的研究。但是从哲学方法论上来讨论的话,确实存在一些非常根本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根本方面是,能否理解、把握和切中当今的社会现实。这是自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方法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和趋势。当然,从相反的方面来说,目前也存在着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强制和现代形而上学的某种巨大的遮蔽。所以在这个时候探讨这个问题非

常必要,也非常有意义。

自近代以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要说明一下,我这里使用的“社会科学”一词,实际上在历史上的用法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些不同用法的根本之点总是表示区别于自然科学的那些学问。比如最早法国人的用法叫做“道德科学”,后来又有许多用法,比如德国人所谓“历史科学”和“价值科学”,后来我们比

较多地把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学术称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德国人的 *wissenschaft* 和我们常用的 *science* 的区别也非常大。总而言之,为了方便起见,我在下面只使用社会科学一词。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第一阶段是模拟和学习自然科学阶段。我认为在哲学上它的奠基人是笛卡儿,后来是斯宾诺莎,由此而基本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渊源,一个财富。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科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模仿自然科学。它的成就,比如讲经济学方面,为什么威廉·佩弟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我想有两个原因。以前也有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但应被看成是经济学科学的前史,比如说经济领域中的重商主义。威廉·佩弟第一个提出了经济学科学的问题。他跟重商主义者提出的问题不一样,重商主义者问如何保持英国的繁荣,这还不是严格的科学问题,威廉·佩弟提的问题是,市场价格围绕着不断涨落的那个平均价格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这是科学问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是,他借用了大量自然科学的方法,把它们引入到经济学领域中去。并且为它加上了数学形态,这就叫做“政治算术”。术语比较奇怪,这里所谓“政治”,实际是我们现在讲的经济,比如家政学讲的不是家庭政治学而是家庭经济学。我认为主要是这两个原因使得佩弟成为创始者。后来比如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魁奈,为什么能够平分这个创始者的荣誉?也是因为他继续推进了威廉·佩弟的方法,这种方法大体来讲就是经济学领域的观察、归纳和演绎等等,大体和那个自然科学很相近,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创始人主要是康德,当然可以一直追溯到维科。社会科学本身的自律性,后来逐渐被意识到并且被突出地提了出来。也就是说,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有很严重的不同,有很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要提示出来,并且要在方法论上划出界限。康德哲学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后来主要在新康德主义中得到了重要发挥。比如提出关于事实的科学,关于价值的科学,这两者非常不一样。“是”与“应当”非常不同,“实然”与“应然”非常不同,关于目的性和关于因果性非常不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我想去偷一件东西或者我想防止别人偷一件东西,

我总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手段,用知性科学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应该不应该偷东西,这就属于价值科学的领域了。这两者非常不一样,康德最初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从而为社会科学的独特方法的探讨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被吸收和扩展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诸多成果,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最重要的,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本质重要的,这就是社会现实的发现,它首先是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伽达默尔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做《二十世纪的哲学基础》。他在这篇文章中讲,黑格尔对主观意识的批判第一次开辟了理解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包括后来马克思的学说以及二十世纪哲学的整个进展,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都是围绕揭示社会现实(它总是以某种方式被掩盖)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展开的。所以他认为像马克思的学说,像现象学运动,像海德格尔等等哲学思想,所提供的方法都集中围绕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社会现实能否被批判地揭示出来。伽达默尔把对主观意识的批判同社会现实的第一次发现联系在一起,而二十世纪的哲学继续着这样一个任务。虽然新近的哲学家们提出的哲学观点,他们提出的方法要求有很大区别,但是根本的一点——即社会现实的发现——则是延续着黑格尔的遗产进展过来的。黑格尔所谓主观意识,简要地说来,实际上就是刚才赵剑英提到的那几种,脑子里的自我旋转,本本主义,还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东西,在黑格尔看来都是主观意识。主观意识的基本特征,黑格尔讲就是局限于“外部反思”。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它不会停留于、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上,却知道如何把一般的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黑格尔反对的就是这个事情,他把这种外部反思看作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看作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与此相反,辩证法要求解决的就是思想如何深入到并且把握住事物的客观内容。也就是说作为自我意识的思想和实存的思想是如何一致的,虽然它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表述。如此看来,以前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是过分简单了,好像随便什么时候偶然碰到的东西——事、物、人,所谓“事实”——已是现实。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现

实还从来没有跟我们照面,它也不可能同我们照面。总而言之,社会现实的照面、发现和揭示,可以说意味着方法论上面的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个方法论任务实际上是由黑格尔和马克思第一次以其完整的形式向我们提示出来的。

另外,我们总以为用抽象的概念或者范畴规定那些对象时,我们就把握了现实,恰恰相反,主观思想的概念或者范畴实际上只是把社会现实遮蔽起来而不是把握了它。黑格尔以其总体性的观点最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这里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最近有人给我看了一本书,那里面讲了某个时代的许许多多可称之为事实的细节——这些细节看起来也是挺有趣的,甚至是耸人听闻的和极能满足好奇心的。过后他问我,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我的回答是:这部书用全部历史细节的真实性伪造了历史。因为这些历史细节可以全是真的,但是历史的现实却并未因此而显现出来。比如,作为一个历史现实的拿破仑将在什么地方显现出来呢?它会在拿破仑的仆人那里显现出来吗?我们可以说拿破仑的仆人知道拿破仑生活的无数事实,知道他的许多无人知晓的细节,所有这些东西合起来就是现实的拿破仑吗?黑格尔说,仆人眼中无英雄,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人毕竟是仆人。如果以为抓住所有细节,抓住他的风流轶事,他的怪诞,他的想象,他的癖好,就抓住了现实的拿破仑,那么这只不过是幻觉罢了。拿破仑的现实在这个地方不出现,甚至在这里出现的还根本不是他。由此可知,所谓现实,特别是社会现实,它如何能够积极地呈现出来,并且被真正把握住,我们要请教黑格尔,而且特别要请教马克思。所以我非常赞同刚才高翔总编的发言,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历史—实践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资源,是社会现实能够向我们敞开的最重要的方法论的源泉,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不仅对黑格尔进行批判,而且对低于黑格尔的思想,即主观思想也进行了批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蒲鲁东的批判,对其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就这个问题我想以后能够写一些东西,但这里就不可能详细展开了。

我还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与揭示社会—历史现实的关系。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在其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

讲,马克思的思想比一切历史学优越的地方在于,马克思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那一度中去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萨特的存在主义都没有深入到那一度中去,而只有达到了那一度,才有资格跟马克思主义对话。虽然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评价是有问题的,但是他确实很正确地认为马克思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中去了,他所看到的東西,许多人并没有看到。直到1969年,海德格尔在其晚期讨论班中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当今所谓哲学只是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完全误解了当今时代的两重基本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

因此我认为,我们中国目前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要求,从近代以来的发展成果来看,当然都要尽可能地加以理解和吸收,但如果我们要有所创新而且能够有所创新的话,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如果你不能理解、不能切中这个社会现实,那这里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创新。所以从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以下两个方面也许是最基本的。第一是中国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现代化的任务。这一任务的现实性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以为可以通过某种单纯返回传统的方式来消解或拒斥这一任务,那么这种消解或拒斥只不过意味着与社会现实的脱离。这是一方面。

第二,我们的现代化任务是在相当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开展出来的,如果不能领会这一点,那么同样是疏远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引进西方的观念、范畴和术语,这些东西哪怕再先进,我们也不是在把握、揭示和切中这个社会现实,而往往只是把这个社会现实掩盖起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切中社会现实的方法论上的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请教黑格尔,来反对主观思想和外部反思。要请教马克思,来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即社会现实)一度中去。就此而言,也许需要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启蒙,以便使社会现实本身能够绽露出来。在这过程中,我们同样需要与当代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方法形成一个积极的对话,而这种对话过程当中的目标,它的最后的立脚点仍然是揭示和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